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七期 ——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9d)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九月	唐 郎
【难忘岁月】惜乎不中秦皇帝”——也谈林彪事件	胡 平
【研究笔记】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	郅元宝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四)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九月

• 唐 郎 •

◇ 一九六六年

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复信说：“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讲述了8月29日北京大学红卫兵如何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毛泽东就此复信，并对章士钊的来信批示道：“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同日，周恩来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另还亲自整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1）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副主席；（2）部长、副部长；（3）政副；（4）国副；（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两高（李宗仁）。

9月1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讲话，主要内容有：

一，政策问题：1．团结大多数问题。依靠左派，教育争取中间派，孤立最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红卫兵在学校是少数，1000多人中，只有一、二百人，要争取团结大多数，除了

顽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首先是对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到工厂首先要请教工人，还有农民、解放军、服务人员，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有的红卫兵的行动对生产不利，与他们对立起来。我们既要革命，又要生产，你们要照顾这一点。不能停止生产，服务行业也不能够停，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到工厂去，可以找工厂革委会不要到车间去，这样大多数人才能站在你们这边，各方面才能支持你们。要与公安部门配合好，团结好，因为公安机关是我们的专政工具。2. 敌我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击谁？依靠谁？主席讲过好多次了，大家好好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地、富、反、坏、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打击。一般在城里已落了户，不需要马上赶走他们。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债，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坏份子，应当回去。要查有实据。右派分子有两种，已摘帽子的，不能还算右派。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如他们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的威风，他的威风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坏活动，还有选举权，就不要打倒。取消定息，要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已经领的退回去也不好，因为这是合法的。对知名人士，如民主人士年岁大了，你们一天去几次，他们就受不了；是否应该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问题了。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个红卫兵父亲是老干部，母亲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们去了就打，这就不好，这样你们在座的许多红卫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对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搜查？如宋庆龄，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能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打击流氓分子太宽了，斗争年轻娃娃，有的有流氓行为，有的只有点偷窃。

二，文斗武斗问题。十六条讲了文斗武斗，社论也讲了。武斗只能体罚，文斗才能攻心。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对俘虏军官都不打。有的人好像打了一下，会壮声势，实际上失去的是同情。红卫兵要解放军和公安部门保护你们。态度不好，不需要打。我们提倡武斗。应坚持说理，主席一直提倡文斗。搜查，要充份调查。公安派出所要谨慎。是否没收金钱？要讨论一下，现在就很被动，未登记，未给收条。不能光靠热情，还要有组织，不能用没收的办法。登记不要弄错了。如要退还就很难算帐。以后要有秩序，有极少数红卫兵，占用了手表、照相机，这就不好。戴高帽、有的20斤重。应当把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提倡文斗，以理服人。保护、爱护公共财产和群众利益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毁了太可惜，应该注意。凡是国家要害部门，首脑部门，要保护，如党中央，大会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解放军要保卫整个国家。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机要档案，不能随便搞乱。到外地去的红卫兵，由于组织准备不好，与各地工人、机关发生矛盾，主要是打人，使当地党委不好做工作，这次要有组织地去。

9月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乌鲁木齐市上千名学生包围和冲击自治区党委，并静坐绝食。此后，新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矛头直指自治区领导机关。10月19日，乌鲁木齐地区及生产建设兵团几千名职工、干部、学生包围了昆仑饭店，以批判“资反路线”为名，要求批斗正在宾馆开会的自治区及兵团的领导人，并于20日宣布绝食。23日，中共中央命令绝食者立即复食，选派代表和自治区领导人一起去北京解决问题，这一事件始告平息。

9月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它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16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后以“三司”而闻名。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道：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最最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好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的力量目前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而奋斗！”（“三司”成立宣言见本刊 z k 9 6 1 0 a）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师生，除了有病的、已经来过或有其他原因不能来的以外，都可以组织来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1人；教职工按每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1人参加。”“来京的学生和教职工在北京的停留时间定为4天，活动包括参观、学习和支持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受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个人按定量交粮票，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应当建立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落实计划，并切实做好来京参观的生活管理工作。”《通知》下发后，大串联在全中国出现高潮。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摘要如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就必须用文斗，来解决人们头脑里的问题。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充份利用大字报，进行大辩论，大鸣大放。这些都要动笔，动口。武斗的简单办法，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不能充份暴露牛鬼蛇神的丑恶面貌，不能肃清牛鬼蛇神的反动毒素。我们提倡文斗，不是要宽恕敌人的罪恶活动，而是为了真正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人民的敌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文斗，就是要充份揭露，深刻批判，把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动言行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用这些反面教材，来教育群众，教育年轻一代。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种文斗的办法，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所最害怕的。我们主张文斗，是因为我们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是因为真理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相信用文斗的办法足以制服敌人。同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不怕人民的敌人捣乱。如果敌人胆敢动武，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刑律，那就坚决依法制裁。

9月7日，毛泽东就一些地方的当权派组织工人、农民反红卫兵事件，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1966年9月4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全文如下：“为了确保党和国家的机密安全，特作以下规定：一、密码、电报、机密文件、档案和机密资料等都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所有机关干部、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都有责任加以保护。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后备的力量的红卫兵，应协同党政机关和解放军负起保卫党和国家机密的光荣责任。二、党政机关的密码、档案、机要资料，未经领导机关负责人批准，任何人不得任意索取和动用。任何人不得拦阻和检查机要交通人员。三、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机要、档案和机密资料部门的办公室和库房。如发生群众性的这类行动时，主要负责同志应立即出来坚决劝阻，号召革命群众起来保卫党和国家机密，防止坏人乘机破坏。如果发现个别坏份子进行破坏时，应在群众中揭露后依法处理。”

9月9日，毛泽东在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信上作出批示（奥地利《红旗》派的来信和毛泽东批示见本刊 z k 0 1 0 4 b）。

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7日批示发出指示，全文如下：

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指出了当前全国各地运动中出现紧张形势的症结所在。怕学生，调动工农整学生的作法是十分错误的，望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立即根据主席指示，对前阶段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总结，检查吸取教训，改进领导。为此，中央决定：

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2．凡是发生调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中的绝大部份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社论说：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挑动一部份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9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说：“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收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和撤消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北京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共百万人。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的对，做得好！”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时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9月16日，康生就安子文、薄一波等出狱问题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这些签字发表‘反共启事’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当时坐狱的人，大致可分三类：一、少数人反对少奇同志这个决定，拒不执行（据说刘格平等反对）。二、有些人立场不稳，组织上服从。三、有些人本来就已经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了。二、三类人，估计70余人。现在有些人的名字，还弄不清楚（已弄清楚一些，补正），现正在继续查证，详情查明后报。”信后还附有5份有关的1936年京津地区报纸影印件。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

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就可以防止坏人浑水摸鱼，就可以避免我们在斗争中抓住次要问题，放过了主要目标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份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费用而致病；私人东西，除政治性的，一般不查抄；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人并讲了话。林彪说：“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9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的公报。万晓塘在受到批斗和关押后，于19日去世，有50万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指出，“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9月25日，陈伯达接见外地来京师生时讲话，他说：“《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看来这一月来，斗争的形式更尖锐，更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意执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虽然形式上撤走了工作组，可他用旁的形式来代替工作组。”

◇ 一九六七年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要求：紧紧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发展和巩固大联合和“三结合”。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9月2日，陕西省西安市西郊未央路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双方动用了坦克、消防车、机枪、步枪等武器，双方死亡近百人，伤残290余人，大批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等，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等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命令》说：“此命令至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反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代表，江青就“5.16”组织、揪军内一小撮、革委会等问题做了讲话。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全国认真学习江青的这一讲话。（讲话全文见zk0209c）

9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批判“桃园经验”。社论说：“本报发表的关于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他“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甚至盗用中央的名义，把它向全国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的大阴谋。”社论还说，刘少奇提出的“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故意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评了陶铸写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才》这两本书，说陶铸倡导“怀疑一切”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这两本书是鼓吹“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宣扬“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充满“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毛泽东审阅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并加上了一段话：“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

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清楚。”

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说：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是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9月16日，毛泽东由南昌抵达杭州，了解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对南萍、陈励耘说：“你们对龙潜不能象对地主那样斗吧，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毛泽东回北京后，决定江西、浙江省军区及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代，要他们把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成员林岗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押送北京。

9月16日至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接见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求红卫兵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 一九六八年

9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文章说：“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文章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内容是：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三、工宣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是“三忠于”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人民日报》先行刊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刊发了毛泽东为该文所写的编者按。《编者按》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

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情况报告》说：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工宣队、军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宣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社论说：“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9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文章说：“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内容。”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成绩。”文章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文章还提出，今后医疗院校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题词的全文是：“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社论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并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文字。

9月22日，陕西省集中力量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了大量武器弹药。据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在省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报告，经过1个半月的时间，全省范围内武斗已经停止，武斗据点、工事、关卡已经拆除，各地的专业武斗队已经解散和瓦解。从8月8日至9月17日，共收缴各种武器7万余件，各种弹药400多万发。全省8个专区、3个市、93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 一九六九年

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毛泽东思想对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辽宁营口松树大队的调查报告》。报告介绍该大队的经验是:“贫下中农必须掌好再教育的大权”,派出贫下中农做知识青年的政治战斗员,一起斗私批修,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上好阶级斗争这门课”。针对知识青年中的思想倾向,进行忆苦思甜,组织现场批判会,批判“智育第一”、“读书做官”、“下乡镀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充份发挥知识青年的积极作用”,对他们正确使用,担任一些工作,在事业中进行再教育。

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各级革命委员会需要增补委员、常委和副主任时,要注意增补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代表,要着重增补优秀的产业工人代表。二、革命委员会中,有调往他处的或红卫兵从学校毕业后下放劳动的,都不要忙于免除他们的职务;对某些犯有错误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应按照“团结一批评、自我批评一团结”的原则进行帮助教育;对于十分急需调动、撤销的革命委员会中的委员、常委、副主任、主任,要在群众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再上报中央或上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指示》包括8点内容:一、毛主席指示“照办”的中央的“5.27”指示、“7.23”布告、“8.28”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的、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二、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对其主要编写人员,应审查分别严肃处理。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八、希望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9月30日夜,林彪突然视察北京西郊机场,他命令该机场的飞机当晚全部转场,用砖头把跑道堵起来,搞一个小规模的演习。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当夜命令“所有空军部队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所进入一等战备;所有指挥员坚守指挥岗位,不准离开”。9月30日至10月3日,空军所有部队、学校、机关和民航进入一等战备,共有1683架飞机在机场担任战斗值班,3900多架飞机进如洞库或野外疏散,东北、西北、华北地区的机场都用机械和车辆都设置了防敌机降落的障碍。这是空军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演习,目的是为了防范苏联象对匈牙利那样,假借谈判麻痹对方,突然派部队进行袭击。

◇ 一九七〇年

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简称“庐山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啊,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的。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书。从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

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子办法呀！”“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这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乾淨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能干得好。”

9月17日，周恩来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周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里脱胎出来的。”“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毛说道：看样子打不起来大战，几个大国都不想打，彼此都怕对方。欧洲许多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也不想打。在谈到中国国内形势时，毛说：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条条专政就是不能发挥各省的积极性，煤炭归煤炭部管，这条线一直插下去，钢铁归冶金部管。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毛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说，开始的时候，各省各城市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后来联合起来了，组织成一个党。开始就是抄俄国，抄苏联的章程。那时候抄十月革命也是必要的，我们没有，自己不会搞嘛。以后逐步学会怎么搞革命，经过多少挫折才取得胜利。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说，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中美会谈在华沙这个地方不好，他们愿意到北京来谈。我们说，你讲的对，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

◇ 一九七一年

9月13日，林彪和家人乘飞机发生意外事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毁人亡。

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 一九七二年

9月7日，毛泽东决定，调王洪文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毛在谈话中称赞王洪文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 一九七三年

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文章说：“一切反动派无不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镇压人民、反对革命的精神武器。……孔子成了封建社会的第一号圣人——‘至圣先师’，孟子则成了第二号圣人——‘亚圣’；而‘孔孟之道’也就成了封建主义的同义语。”“两校大批判组”是1973年下半年由迟群、谢静宜建立的，共有30多人，用“两校大批判组”、“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等10几个笔名发表文章。

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就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毛说：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赫鲁晓夫1954年到中国，1955年就跟阿登纳讲，请他帮助反对中国。他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就高兴呢，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阿登纳批判我们，说我们骄傲，说我们太骄傲了，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反对我们，那不骄傲一点也不行呢。苏联野心很大，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美国人到底搞不搞孤立主义，是值得怀疑的。孤立主义对欧洲不利，对中国也不利。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

9月15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发表署名石仓的文章：《论尊儒反法》。文章认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孔子是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文章认为，“焚书坑儒”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溃了儒家的复辟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石仓”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成立于1971年7月。这个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以“罗思鼎”、“康立”、“石仓”、“翟青”、“方海”、“齐永红”、“梁凌益”、“戚承楼”、“勒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方若梁”、“石一歌”、“任腴”等80个笔名发表了1000多篇文章，出版书籍几十种。

9月20日，王洪文同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还要继续。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没有事。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青”的文章：《驳林彪的“变相失业论”》。文章说林彪“恶毒攻击干部上五七干校是什么‘变相失业’”，又说：“我们干部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干部是我们的终身职业，无所谓失业。”“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党和毛主席对干部的培养，根本不是什么‘失业’”。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候赛因·沙菲，就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毛认为，美苏一致是表面的、骗人的，而不一致是本质的。毛还说：秦始皇是中国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一世。最近，林彪还骂我叫“秦始皇”。中国人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是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笔名，成立于1972年。

9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文章要点是：“‘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新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奴隶主贵族的一场政治斗争，是统一不久的秦王朝粉碎旧势力复辟阴谋、维护新封建统治的一次果敢行动，……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一九七四年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一文。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是由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的。《通知》说,关于贺龙的问题,经中央查证甄别: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中央决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 一九七五年

9月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邓小平随后也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一〇九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三千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公安部根据以上指示,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对341名国民党省将级以上人员和3300名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核实材料,依法履行释放和安置手续。

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建设大寨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问题,共有370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说,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

9月22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名台湾武装特务和49名武装特务船船员,全部宽大释放。

◇ 一九七六年

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见本刊zk0209c)。

9月10日至12日,王洪文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擅自指示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另立办公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各省、市的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王洪文办公室的通知后,立即与华国锋联系,提出疑问。华国锋得知此事后,经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汇报。

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社论中首次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嘱咐。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悼词全文见本刊zk0209c)

9月19日,华国锋正式决定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始封存毛泽东的文件。在收回被江青拿走的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与

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上，发现文稿已被江青改动。

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两人都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为好。同日，聂荣臻也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聂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叶剑英软禁了，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中国为此要倒退几十年。聂还说：解决“四人帮”问题，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聂要叶早下决心。叶对杨说：请聂荣臻放心。同日，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丁盛提供的有关军事上对上海构成威胁的情况，以及上海突击发放武器等准备情况。张对徐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件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同日，王洪文在上海对人说有人不认真保护毛泽东遗体，“保护主席遗体是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春桥和我对有些人的疏忽很有意见。”

9月22日，张春桥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写信说：“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象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是大有人在的。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9月23日，王洪文在打给王秀珍的电话强调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华国锋所提与“四人帮”斗争不可避免并请叶剑英考虑解决方式、时间的意见。叶剑英指出：同“四人帮”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要有严密周全的部署。

9月27日，张春桥在给上海的指示中说：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派自己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市委常委传话，要求上海要“经常分析阶级斗争的形势”，“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曲折，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现在有人“要搞上海”，“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

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拒绝“四人帮”提出毛远新留在北京的建议，也拒绝了张春桥提出安排江青工作的要求，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坚决支持华国锋的决定。

9月30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人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座谈会。会前，姚文元在给新华社的指示中称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毛主席遗志，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但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作的总结讲话里，却只字不提“按既定方针办”。

□ 作者邮址：tanglang2000@hotmail.com

~~~~~

【难忘岁月】

## “惜乎不中秦皇帝”——也谈林彪事件

• 胡 平 •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林彪事件造成的强烈震撼。许多人都说，是林彪事件使他们开始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觉醒的，不少人的觉醒要比这早得多。

记得在林彪事件传出后，我们那个朋友圈子里都很兴奋——“好啊，终于有人要干掉毛泽东了！”其次是遗憾——“惜乎不中秦皇帝”。当时，我们听到关于林彪事件的许多不同的版本，真假莫辨（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对林彪事件的真相仍然不敢说是十分清楚）。后来又读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替林彪功败垂成感到惋惜。

按照我们当时的分析，如果毛泽东此前正常死亡，从而使林彪得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或者是林彪神不知、鬼不觉，秘密杀死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取而代之，林彪都可能继续“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沿著毛主席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在这种情况下，“‘五七一’工程纪要”也许就永远地藏之密室。当然，在实际措施上，林彪也会大幅度地修改毛的政策，但他很少可能、以致于决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统治本身。唯有在林彪被迫与毛摊牌，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林才可能亮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旗号，以反对毛的极权专制为号召，这样他就有可能采取一些具有更多的自由化倾向的措施。我们本来对林彪并无好感，不过我们相信，如果林彪不得不公开和毛对抗，那么，形势将把他推上历史正确的一方。

一九八五年春天，我应邀去广州参加由武汉《青年论坛》杂志和华南师大哲学所合办的中青年学者讨论会。主办人之一，华南师大副校长、哲学所所长黎克明教授邀我去他家小坐，聊天时说起林彪事件，他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还是很马克思主义的嘛。”我赶紧点头称是，从此对这位前辈刮目相看。

后来，我听说林彪的一些亲友故旧——包括林彪的儿媳张宁和女儿林立衡——要写回忆录，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于是赶快找来看。一看之下，未免很失望。因为他们竭力想要证明的是林彪事件纯属冤案，林彪并没有什么反毛害毛的企图，对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并不知情。

但无论如何，林彪事件都是对毛的沉重打击。毛后来公布一封据说是文革前写给江青的信，想证明他对林早有戒心。不过这一招的效果很有限。

当年，我曾就林彪事件写了一首诗《闻林彪事件有感》：

惜乎不中秦皇帝，  
毕竟渔阳鼙鼓来。  
纵有家书欺海内，  
奈何神像落尘埃。

注：“惜乎不中秦皇帝”一句，取自明末清初诗人朱彝尊的“水龙吟·谒张子房祠”。这首词大概知道的人不多，兹抄录如下：

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

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  
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遗庙彭城旧里，有苍苔断碑横地。  
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  
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口空闭。  
怅萧萧白发，经过临涕，向斜阳里。

~~~~~  
【研究笔记】

关于“文革”研究的一些话

• 郜元宝 •

1、学术研究与情感记忆

关于“文革”，孙犁说，“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去写这种东西，我也不愿去回忆它。”孙犁只说“我不愿”，并非针对别人的“文革”回忆或“文革”研究而说“你不能”，但“这种东西”、“不愿去写”、“不愿去回忆”云云，客观上还是将他摆在了一个孤立的地位——至少在口口声声要求研究“文革”的“知识分子”群里，他是孤立的。这种对待“文革”的态度，充份表现了孙犁的清高，决绝。

讲到历史的黑暗，鲁迅也曾感叹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查考，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鲁迅自己对历史是喜欢“察见渊鱼”，一直掘下去的，但他奉劝那些脆弱的人，“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和孙犁不同，鲁迅是专为别人着想的另一副心肠，慈悲中隐含了愤激的。

中国目前的“文革”研究尚处于暧昧状态，我觉得这时候，孙犁式的清高、决绝，鲁迅式的愤激、慈悲，都很可贵，因为其中包含了普通中国人对墨黑的往事“不堪回首”的朴素情感——一切历史研究不容回避的起点。

孙犁或鲁迅对待历史黑暗的态度，本来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现在却越来越少见，而且初听起来，还很不入耳，觉得他们对人类的灾难不感兴趣似的。现在流行的方式，是要么不许随便谈论，要谈就以既定的红头文件为准；要么不停地吆喝着，保存历史材料啦，公开档案啦，深入研究啦，设博物馆啦，然而左顾右盼，并不实做。另外，就是具体而孤立地研究“文革”某个方面，比如“文革文艺”、“文革政治”、“文革经济”之类，慢慢做成专业的课题——按学界一贯的脾气，我们知道不管什么一旦专业化，就日益玄妙，和普通人乃至本专业之外别的专家再没有什么实际关系了。

孙犁“不写”，鲁迅“不闻”，其实已经写了，闻了，只不过诉诸直接的感情评判，不具“反思”性，当然也不能列入所谓“反思文学”。非反思的情感评判，不能造成什么理论，生产什么话语，更弄不出什么博物馆，但惟其简单，处在感情“原始发露”阶段（“意气用事”？），这才不至于扭曲，造作。

对“文革”的亲历者来说，反思，研究，谈论，固然重要，但如果最终模糊乃至扭曲了对

“文革”的情感记忆，就很不上算了。

任何形式的“文革”研究在开始之前和进行当中，都该想想这一本帐。

2、倘若这样，还是不研究为妙

为公认的好人说几句好话，对公认的坏蛋再踹两脚。提到胡风，该夸什么，现成的；提到舒芜，该骂什么，现成的。一个是锦上添花，并且“我和四大人说过话了”；一个是落井下石，“与众共弃之”。

倒过去五十年，胡、舒换一下位置，围绕他们两位的谈论方式甚至说话人都不变：依旧是锦上添花，“我和四大人说过话了”；依旧是落井下石，“与众共弃之”。

这都没什么，关键是别站错队，是屁股问题，立场问题，——更重要的，是心里得有一把永远不会打错的算盘。

“现在的工作”往往如此。

但改了名称，曰“知识分子的批判”。

“文革”研究不能这样子的，否则，还是不研究为妙。

3、不要吃污点饭

在善于自夸与自卖的民族中，历史的耻辱，从来不是在自己身上开出的认识历史的窗口，只是证明自己的清洁与荣耀的远远推开、“与众共弃”的他人身上的污点。

他人的耻辱永远是自我欣赏的最好的镜子，历史的黑暗永远是今天的光明的最好反衬。
一冯道，一周作人，一余秋雨，衬出多少人的清洁与神圣！

只有弱者与真的“不辩解”者在耻辱中煎熬——这耻辱往往是强者加于他们的污蔑与冤谥，本是各时代的强者或伪诈者应该背在自己身上的标志。

耻辱历来就是弱者和诚实人的墓志铭，强者与伪诈者的通行证。

历史的耻辱，大多已经转化为某些“败类”的污点，然善读史者，也可以由此照出所有吃污点饭的强者和自诩为纯洁无瑕的少年的更大的耻辱。

“文革”研究，当然也不能是专吃污点饭。

4、都是被告

反思历史，倘若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特别是最无节操的知识分子），就不仅无法窥破领袖的真相，也永远无法了解历史本身的真相，因为领袖和群众（主要是群众）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正如琴弦与弹琴的手一起弹出了各种乐曲。

历史法庭上，似乎可以作为原告的，其实也都是被告。

只有“把自己也烧在里面”，才能真正谈得上对“文革”进行研究。

5、放宽历史的视野

研究“文革”，不能把“文革”放在一个孤立的历史时段。“文革”研究，应该是反思整个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要放宽历史的视野，远的不说，至少应该从“五四”一直看到今天。

“五四”透过“文艺复兴”以降的近代人文主义来理解和接触“西体”，这样把握的“西体”怎么能说是真正的“西体”呢？退一万步，即使“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平等”诸价值真正被中国人认识到了并努力追求着，但这些价值难道就已经囊括了“西体”吗？

比如，在这样理解的“西体”中，基督教的信仰就无处安放，而由希伯来精神产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无处安放，与其息息相关的希腊精神及其在近代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被我们很好地把握。

“五四”知识分子几乎一致反对或冷淡基督教，并且自作聪明地要么把它斥为“精神鸦片”，要么把耶稣仅仅理解为“人之子”，把他的上帝之爱仅仅理解为人道主义的道德热情，全然无视其神学根底，难怪周作人要把新文化的本质界定为信仰缺位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了。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五四”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接触到西方文化的“体”，同时中国文化的“体”又从根本上被否定了，剩下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们”和孤零零的“今天”，只有眼前的现实和关于将来的幻想，难怪“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一会儿是现实主义，一会儿是浪漫主义，却从来不曾有过深厚雄浑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罢，都是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既不考虑中西方文化固有之“体”，也并未真正严肃地思考过那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所谓“现代中国文化”的“体”究竟是什么。这样的实用主义，区别于早就宣布过时的“中体西用”以及实际上很难推行的“全盘西化”，只能是“无体乱用”。

“文革”就是这种“无体乱用”的登峰造极。“文革”绝不是百年中国现代史的一座孤岛，它只不过是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的一个特别醒目的标志而已。所以应该深入研究“文革”和中国现代文化多方面的关联，否则，把百年历史的所有黑暗全部装进“文革”的垃圾箱，这种研究固然省事，却必然会掩盖“文革”的真相，更会因此而掩盖了百年中国历史许多已经浮出水面的真实。

6、只以可疑的个人为基础的道德批评

人类思想的能力，总是表现为对值得一思的东西的亲近，对那要求思想去思及的总喜欢隐蔽起来的召唤者的虔诚的感谢与回忆。本真的思想，永远是一种否定思想者自己的孤立存在而不断回溯到存在的源头的行为，它所警惕的，应该是将思想者自己封闭起来，再从封闭的主体由内向外的表演式的所谓表达。这种表演式的表达，在中国，最典型的的就是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批评。

在思想丧失其本己能力的过程中，最少不了民族特色的道德批评的聒噪。每当思想资源匮乏之际，道德资源总是出奇的丰富，这是值得思考的现象。

在我们这里，思想和道德似乎各有源头。不仅如此，思想和道德甚至彼此对立。道德资源来自内心，此外，主体一无可恃之物。道德主体只相信自己，而“我自己”也只能由“我自己”

裁决，他必然要拒绝任何在自己之外的超越者的审判。

所以，只以可疑的个人为基础的道德批评，从来就已经高尚到无力思考高尚的本质，并也堕落到无力思考堕落的本质。道德作为一种能力，在道德批评家那里始终为虚骄的自我所垄断，不可能超出这个自我而汲取别样的资源，获得别样的能力。道德主体怀疑自己之外的一切，并觉得有能力审判一切，却不肯对自己提出哪怕几秒种的怀疑。他们以对一切美好之物的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占有，来掩盖自我的空虚，换言之，以对道德力量的极度夸张掩盖思想上一无所凭的极端之无能。

在深渊的边缘两腿发抖的道德主体，一无依靠，也确实不知道依靠什么，只好依靠“我自己”。于是，那被无限夸大的仅仅属于“我自己”的道德神话，实际上只能是对自身虚弱的掩饰，而被如此掩饰的道德主体的内心，和不道德乃至反道德，只有一步之遥。

关于“文革”的朴素的感情记忆，要走出“原始发露”的阶段，就应该超越粗糙的人道主义和更加浅薄的个人主义而向上升华，只有这样，中国人的“文革”记忆，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培养只有孤立的个人的所谓道德理想主义的温床。

不错，文革是反人道的，但在反人道之前，它已经率先将东方的“道”和西方的“神”系统踩在“大写的人”的脚下了。因此，仅仅从人道主义的诸价值出发来反思“文革”，不仅是不够的，而且很可能反过来看到并且坦然地欣赏起“文革”牌子的“人道”来。

7、回忆疗法

弗洛伊德施展催眠术，远兜近转，循循善诱，让人想起遗忘的某件特别的往事，于是心开意豁，一身轻松。善哉，“回忆疗法”。

有美好过去的人的回忆，让渴望幸福的人羡慕不已。但不能过火，否则就是“臭美”。

有悲惨过去的人的回忆——思思旧痛，讲点“真话”——更能得到喝彩，似乎大家也因此而百病全消了。

但也要有分寸：“真话”必须一两三钱，不能足斤；旧痛必须已经结疤，疤痕最好若隐若现，与健康的皮肤浑然一体，不能正在流脓淌血。

民族的过去是整体，但从各人的过去投射出来，就各不相同，或繁花著锦，或阴森凄惨，或为康庄大道，直通天国，或如大毒蛇，啮啃着脆弱的灵魂。

不断回忆美好的过去，慢慢就会修炼成幸福的白痴；一味从伤处掘下去，也是傻瓜的所为，如祥林嫂，“我真傻，我真傻”，一遍又一遍，结果“老了”。弗洛伊德医生只好摇头。

对有些人，是回忆疗法；对另一些人，是回忆自杀疗法。

但这不包括冬去春来，“咸与回忆”，和拿着棍子专门帮助别人回忆的人的回忆。

也不包括苏童、余华、王朔等在别人奉旨忆苦时不負責任、苦中取乐地回忆六、七十年代——他们的童年和少年，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那是艺术。

我们现在回忆“文革”的仅有的艺术。

8、也许只是一个“无”

总有人惋惜，对“文革”那样的历史，竟然至今未见丰富而深刻的反思。

也总有人预言，说这样的反思终究会有，只不过禁锢太严，时辰未到。

惋惜者和预言家都认定理想的反思曾有，已有，会有，就像种子埋在地下，条件成熟就破土而出；又如财宝藏在暗中，强敌退去，便可堂皇地归于物主。

但都没有想到：该说的，能说的，都已说出；该说、能说而不让说的，也已在闲言碎语中泄露无遗。

那未曾说出的，也许只是一个“无”。

判断民族将来的语言，看它已经说出的，便已足够。

关于“文革”，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早没有什么可说。

本来没什么，何必期待有什么。

真要期待，就只能期待惨剧再来，而且比上一次的更惨。

蚌病，是并不一定生珠的；更大的可能，倒是继续烂下去。

□ 2002年5月3日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二十四）

• 周孜仁 •

（续上期）

## 21，毫无意义的插曲：钦差大臣的重庆之行

1966年10月6日，首都三司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所谓“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我读过该次大会的报导，印象最深是“北航红旗”代表的发言。我怀疑那篇发言稿是经某演说家反复推敲润色的，全文警句叠出，妙语连珠，每个段落都足以赚得如潮如瀑的掌声。比如有这样一句：“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少数。可少数有什么稀罕？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两个人，敢于向全世界宣战！”（大意）还有一句，演说者说他很自豪，“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年轻人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完整地重演了一遍。”（大意）我当时理解，发言者的意思是说，造反派从制造舆论开始，

到组建政治组织（当然是指战斗团之类），经过和政敌（当然是指当权派和他们的附庸保守派）的反复争斗，再到夺取政权（即当时的抢广播站、印刷厂之类），年轻人有幸在短短两三月内非常简洁、非常有效率地走了一个全过程。

后来的事实说明，1966年10月6日那个后生仔的结论下得实在太匆忙。如果我们大体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应该补充的是，直到1967年夏天的全国武斗，才算把那句话补全了：人类的械斗厮杀，在短短几个月内，便从野蛮时期的棍棒、石头，到铁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在短短一两月内非常简洁、非常有效率地升级到了现代的枪炮、坦克，即由冷兵器时代迅速前进到热兵器时代。说那句话前半半时，可以很浪漫很威武雄壮，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1966年的武斗大不了就挥挥拳头，抡抡皮带，死个把人就很不了起了。真刀真枪就不一样了，尤其重庆这种步枪，坦克、军舰、榴弹炮、高射炮、海岸炮、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应俱全（幸好这儿没有飞机制造厂，要不，海陆空整个儿添全就更热闹了），准确地说，那已经不叫武斗，叫战争了。面对紧张气氛，很多同学表示困惑，困惑无计，干脆一走了之，回家，谈恋爱，帮爹妈种庄稼去了。

就在这时候，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谢富治、王力，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带着几个“北航红旗”的学生到西南巡游来了。他们是6月27日第一站到达昆明的，据他们自称是来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指示。接着，7月4日离开昆明到达成都，还在成都军区主持了什么会议，接着到达重庆，他们的快速穿梭，当然也是想要“就地解决问题”。

关于他们的重庆之行，815战报第32期用大量篇幅作了报导。题目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文章说，谢王诸人“受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派，于七月十三日抵达重庆，并于十四日凌晨接见了八一五革命派和山城砸派。中央首长听取了双方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从报纸全文刊载的王力讲话中，我们感觉到他们似乎也想稳定局势，因为讲话中一直强调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说“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二、三月份的事”，中央十条和五条发出后，“四川问题，重庆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解决。”讲话还一再说重庆驻军（54军）“是毛主席的好部队，是可以信赖的。”在天下大乱的危局面前，军队是唯一尚存的权威。肯定军队，事实上也就是强调稳定。

中央大员的到来，给战火初起的重庆和迷乱惶惑的重庆人，似乎带来一线曙光。

但是没有。

首先，即使是从“毛主席身边来”来，他们也未必知道毛的心事。那时候，毛根本就不想武斗降温。据文革史家印红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一文披露，7月18日，即王力重庆讲话后的第四天，毛在武汉召见周恩来、王力等人便明确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是15日到秘密到达武汉的。他想亲自出马，在年轻时代曾给过他横空豪情的地方解决问题，抓个典型样板指导全国。13日，即谢、王诸人赶到重庆当日，周恩来也正匆匆忙忙赶赴武汉为毛的巡视作安排，并电告谢王诸人火速赴鄂听候提调。因此14日凌晨谢、王对重庆两派代表的接见极端匆忙。会议是在警备区礼堂进行的。《815战报》载：“会后，首长和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然后登上直升飞机，在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离渝返京。”

战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那张合影照片。重大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挤在谢身旁抢了个恰到好处的镜头：一脸笑容可掬，充份凸现出八一五战士紧跟党中央继续革命不动摇的满腹衷忱。其他人也都笑容可掬，表示对首长讲话的一致拥护——其实，这些都毫无意义，业已被

仇恨全速驱动的战车，已经把整个山城拖入火海。而且，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这几位大员不是返回北京，而是开始吉凶难料的武汉之行。几天后，就是那个王力，因执行毛的意图竟惹得武汉“百万雄师”冲冠一怒，直接导致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事后，我听武汉的老百姓危言耸听地告诉说，如果那天不是王挺身而出，让群众抓走，秘密住在东湖宾馆的毛就差一点儿出事了。老百姓说，毛多年不坐飞机的，那一回，武汉满城都在都兴高采烈欢呼“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这时，毛泽东金蝉脱壳，坐上飞机，匆匆忙忙潜回北京去了。伟大领袖遭此险厄，自然举国震惊，于是全民共讨之，全军共诛之。东海舰队紧急奉命西进，溯江而上，近逼汉口，预防鄂省兵变。被群众释放回京的王力抵达首都机场，“第一夫人”江青顶着烈日亲自迎接。据看过记录片的同学说，这位三十年代上海滩的三流明星非常带有表演性质地热烈拥抱了王。纪录片名《北京支持你们》。接着，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亲自主持大会，欢迎王等人凯旋归来，愤怒声讨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一伙的滔天罪行。在中国，中央的权威一旦受到挑战，任何报复都不嫌过。据说，该记录片有副统帅林一本正经站着讲话的镜头，而臣下王力却舒舒坦坦坐着凳子上悠哉游哉。看过影片的人于是又说了，王力你算老几？不过被群众斗了斗嘛，连喷气式也没有坐，伤得就那么重？站都不能站了？真也忒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题材，足够让后世的艺术家用演绎出票房价值极高的历史大片。而对于山城老百姓，乃至全国老百姓命运关系更大的，却是“七二0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怒气冲冲的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群众组织及其他方面代表，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第二天的《文汇报》以传单的形式，刊登并散发了这个讲话。

看到这位权力很大的毛夫人的“懿旨”，我们整个报社都震惊了。传阅过这份《文汇报》，我们不知道是恐惧？困惑？还是松了口气？既然中央都不想控制局面了，我们还期盼什么呢？没有谁能保护你了。打吧！破罐子破摔，就名正言顺地乱打他一气！天下真的大乱了。

下面的事件是谢、王离开重庆之后一个月内发生的。我把它们从重庆文革研究史家陈晓文的《重庆武斗大事记》中直接摘录于后：

1967.7.25 两派在工业校武斗中使用枪支。其后全市相继发生抢劫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事件，武斗全面升级。

1967.7.31—8.6 荣昌县城两派大规模武斗，参战共600至700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78人。

1967.8.3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用高射炮击沉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舰上三名军人罹难。

1967.8.5 两派在建设厂清水池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打死22人，伤多人。

1967.8.8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以三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打沉船只3艘，创12艘。

1967.8.12-13 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和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

1967.8.12-13 望江机器厂武斗队进攻驻厂部队指挥部（设在郭家沱中学），打死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两名战士，一名工人。两派在解放碑地区激战，交电大楼及临近建筑被焚毁。

1967.8.14 两派在嘉陵江大桥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燃烧市二轻工业局大楼、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房及部份设备。

.....

阅读这些条文，犹如阅读小学历史课本上的大事年表，也许会感觉过于乏味。作为注释，我想在下面再直接引用一段文字。这是一位部队官员在当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讲话。讲话介绍了军工企业造反派头头方文正（815派）和邓长春（反到底）在八月武斗中的一些“罪行”，我以为它们基本可信：

“1967年8月18日，在舰艇反到底一号船上邓长春为了纪念武斗中打死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追悼会上，邓长春亲自下令枪杀两个革命同志，为李鲁沂这个坏蛋祭灵。邓长春本来决定要枪杀四个同志，其中有两个学生遭到别人反对才没被杀，但陪了杀场。……当时邓长春把李鲁沂留下的手枪交给付明礼，令他杀害了这两个同志，尸体被丢在了江里。”

8月22日，815派撤出空压厂，撤出前，方文正“阴险地问大家，地下室二十多个所谓俘虏怎么办？有人说用手榴弹去把他们全炸死。方文正同意了并指名三个学生去执行，……后地下通道堵塞，被火力封锁不通，未去炸成。23日晚，……一个叫何大发的说，”全部炸死太多了，把有血债的五个打死“方文正同意了，并叫何大发带三个学生去执行，何大发就将五个人提出来带到一个车间旁边枪杀了。……特别残忍的是刘素德同志怀孕五个月。邓（刘的丈夫，也属五人之一）说：”你们把我杀了，不要杀我爱人“，遭到何大发拒绝，邓又要求说，”你们等刘素德把孩子生了再杀吧！“何大发等人说不行而全部枪杀了。”

几年前，好莱坞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曾用非常真实的镜头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血腥场面，让人视而全身颤栗。而现在，当我重新摘录曾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些杀人故事，我除了恶梦般的震惊，还有，就是深深的自责：这一切，不过才过去三十多年呀，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就忘却了？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